



共生论

文化共生

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 和谐文化构建研究

邱仁富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共生论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

文化共生

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 和谐文化构建研究

邱仁富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路径,中国梦有中国的文化逻辑。在一个多民族文化共生的国度,如何实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共生发展,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谐文化是人类社会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凸显当代社会的价值追求,为现代社会提供锐利的精神武器。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关系到民族团结、民族发展的大局。必须要不断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挖掘民族文化特色,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抢救濒危文化,实现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发展,为民族和谐发展、民族共同繁荣提供精神力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共生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构建研究 /
邱仁富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13-10803-6

I. ①文… II. 邱… ①少数民族—民族文化—
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G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 013663 号

文化共生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构建研究

著 者: 邱仁富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出 版 人: 韩建民

印 制: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mm×960 mm 1/16

字 数: 43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10803-6/G

定 价: 5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26

印 次: 201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1-5474297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文化共生与民族地区和谐文化的构建研究”

(07CSH023)研究成果

序

文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

王天恩

文化是我们的创造物,但文化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成为我们性灵的空气、养分和土壤,形塑着我们的灵魂,决定着我们的发展。文化关乎国家根本,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化文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了许多重大部署,深化文化改革是应有之义。《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决定》为推动我国文化建设指明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球性视角指明方向,为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奠定基调。因此,新时期推动文化建设要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文化全球化的两种路径

文化具有多样性,地球之美更在于其异彩纷呈的文化。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在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具有差异性。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推进的时代,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碰撞日趋频

繁,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也日益深入。由此便带来一个大问题:在文化多元化时代,不同文化如何相处?亨廷顿曾经忧心忡忡,担心未来的社会冲突,将会是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担忧不是毫无根据的,各种不同文化在多元文化时代如何共同发展,确实是一个日显迫切的大问题。国内外学者为此出谋划策,提出了很多思路,诸如冲突论、共生论、对话论等。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保罗·尼特提出宗教对话,认为不同的宗教之间可以通过对话来化解冲突,力图化解文化霸权、文化入侵、文化非领土扩张等现象,为推动世界多元文化发展提供思路。在多元文化交流互动日益频繁的时代,这种努力具有历史性意义。多元文化时代,不同文化之间的和谐至关重要,它们的和谐发展有助于培养人们养成一种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文化的力量无比巨大,马凌诺斯基曾经用“文化深深地改变人类的先天赋予”评价文化的功能。多元文化的和谐发展,确实能够改变人类的许多方面,关系到文化全球化的前景。

简而言之,文化全球化主要有两种路径:

一是经济全球化进程带动文化全球化。所谓文化霸权、文化入侵、文化非领土扩张,都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跨国企业的全球性扩张,经济资源的全球性配置,经济全球化为多元文化交流搭建起越来越多的平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主动改革的方式与世界接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空前。在经济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外部资源的进入带来了中国文化与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始终伴随着世界多民族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过程中的文化交流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方面。资源的全球性配置、市场的全球化运作等都为文化的全球化铺平道路。在经济全球化的带动下,世界各民族文化在中国的文化舞台上交融和碰撞,成为文化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层面。文化的非领土特征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逐渐显现,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性流动和世界多元文化在一个国家的会师,都使得民族文化越来越具有世界性特质。因此,由经济全球化发展引发的各国文化的交融发展是文化全球化的重要路径。

二是人类思维方式的普遍性特征,倒逼文化全球性交流。文化与人们的思维方式密切联系在一起。人是思维着的动物,人们的思维方式决定人的行为方式,而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养成和改变恰恰与其所处的文化类型密切相关。有什么样的文化就容易培养什么样的思维方式,造就人们之间思维方式的差异性。

这是文化决定人的思维方式的一面。由于文化的地方性特征,使得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具有地方性特征。正因为如此,文化深深地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世界不同文化的差异,必然导致人们思维方式的不同。千百年来,中西文化的交流和碰撞,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不同思维方式的差别。

不同的文化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思维方式又形塑着不同的文化,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特定的文化,这种文化就决定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文化就是化人,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一定的思维方式,又在一定的思维方式下行动,逐渐积淀成、形塑着特定的文化形态。正如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续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同样,人们创造文化,总是基于既定的条件,并与人们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这就深层次地与人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人们的思维方式在特定的文化中形成,思维方式形成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的条件下,思维方式在文化创造中又具有决定性作用。

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不同的文化联系在一起,同时又与共同的人类学特性密切相关。我们既要看到文化的地方性特点导致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地方性差异,又要看到人们的思维方式有着更加根本的共同人类学特性。由于隐含着更加深层次的人类学特性,人们的思维方式又具有共同性。在人类早期实践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的共同性特征更加明显,这种共同性有利于人类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们的思维方式日趋复杂化和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分化,但是共同的人类学特性仍然存在。因而,在人类思维方式的特殊性表现背后,又具有基于人类学特性的普遍性。从更高层面上说,人类和其他动物不同,有着某种趋同的思维和价值观念。在这种共性思维和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实践中,逐渐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形成不同文化共同具有的根本属性。这可能正是费孝通先生喜欢用磁场的原理来破解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原因,因为不同文化的界定应当是“边际”的概念,而非“边界”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具有共同的人类学特性,而人类学特性又建立在共同的进化、生存和发展条件基础之上。这既决定了共同的人类学特性,又决定了人类的共同关切。相同的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在条件和方式决定了共同的人类学特性,人类在这一共同存在基础上的实践不仅改变着既定的存在基础,同时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直至通向人类更高层次的发展。由此,思维方式的改变,也在倒逼文化走向全球化。现代社会人类更加关注地球的安全,关切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一个国家的危机往往也是全球性的危机,共同应对全球性风险也逐渐被人们接受。思维方式的改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实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从而形成新的文化特性,倒逼文化发展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视野和全球化特征。

二、文化全球化中的地方性知识

知识的人类学特性是人类知识的地方性显现。人类学特性反映两种文化形式:即全球性文化和地方性文化,它们内在地反映了文化中的普遍性知识和地方性知识。

根据科学发展的整体过程,人类认识发展到今天,地方性知识的发展出现两种主要形态。一种是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抽象体系性知识;另一种则是没有发达的形式逻辑作为基础的具体整体性知识。两种形态的知识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际遇。由于逻辑学的高度发达,在形式逻辑基础上,很容易过度应用而片面发展,如果发展态势造成一种误解,误以为抽象普遍性知识就是我们追寻的最终目的,就会误入歧途。就像儿童过早进入严密的形式逻辑训练,很容易使人的非理性、非逻辑方面能力的发展受到阻碍,使人片面发展。而没有发达的形式逻辑,经验思辨积淀长了,一方面在概念体系方面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另一方面整体领悟所得以及在此基础上得到的意境会与在形式逻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抽象概念体系有很大不同。这样为跨越式发展积累了后发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地方性知识超越西方地方性知识研究具有很大空间:借助建立在形式逻辑基础上的抽象普遍性思维成果和方式方法,加速跨过抽象普遍性阶段的“卡夫丁峡谷”,可能赢得中国地方性知识的跨越式发展。

文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关于这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将消解地方性知识。在这种观点看来,文化的全球化运作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被冲击、改造,甚至吞噬,由此带来的就是地方保护主义的“拒拆”文化的共同性特征,甚至抵御外来文化的传播。另

一种观点认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越发展,越是具有全球性的特征。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彰显了地方性知识的全球性价值。因而要发展地方性问题,只有地方性文化做强做大才能更好地走向世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世界确实是相互依存的,完全没有与世隔绝的可能”^①。文化的全球化和地方性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不能截然分开。在相互促进、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不同的地方性文化实现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也实现世界文化的地方性彰显。不管文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多元文化的交融都必须解决多元文化发展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之一,就是从共生的视角理解多元文化之间的全球性问题。这种文化共生,主要可以分为互补型共生和相克型共生两种类型。

多元文化互补型共生,主要指多元文化之间的发展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费孝通指出:“中原和北方两大区域的并峙,实际上并非对立,尽管历史里记载着连续不断的所谓劫掠和战争。这些固然是事实,但不见于记载的经常性相互依存的交流和贸易却是更重要的一面。把游牧民族看成可以单独靠牧业生存的观点是不全面的。牧民并不是单纯以乳肉为食,以毛皮为衣。由于他们在游牧经济中不能定居,他们所需要的粮食、纺织品、金属工具、茶和酒等饮料,除了他们在大小绿洲里建立一些农业基地和手工业据点外,主要是取给于农区。一个渠道是与中原政权的馈赠与互市,一个渠道是民间贸易。”^②这是一条重要的互补型共生路径。文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的互补型共生,既要化解西方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吞噬,增强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又要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优势,实施地方文化的跨越式发展,彰显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优势,从而使得文化全球化与文化的地方性对接起来,互通有无,相互补充,共同推进多元文化繁荣发展。

相克共生型与互补不同,强调事物之间的相克,而在一个生态链条中又能够长久共生。这里的关键是要研究在多元文化之间的相克共生是否具有可能性空间,中国古代文化早已蕴含这种思想。所谓金、木、水、火、土,它们之间构成一个相克相生的生态链条。在五个要素之中,缺乏任何一个都不利于事物共生发展。事实上,在东南亚地区也发现青蛙、蜈蚣、蛇之间相克共生的现象,三者间两两都

① [美]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5 页。

② 费孝通,等:《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1 页。

水火不容,但是三者之间却能平安共存、相互共生。文化全球化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共生,可以探讨相克共生的理念,探索不同文化相互冲突碰撞中的共生问题。

这就是说,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面对外来文化的问题,既要看到国外强势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甚至生存威胁,又要运用相克共生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为探索少数民族文化与国外强势文化之间的共生提供一种可能性空间。只有实现多元文化的共生发展,才能为中国梦的实现提供良好的世界环境乃至精神支撑。

三、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梦

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地方性知识发展,必须充分考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在少数民族地区,就要重点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凸显民族特色,体现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特性,是地方性知识建构的基础。

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性文化的发展,涉及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

一方面,弘扬民族传统和改造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探索文化全球化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的出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赖于多民族的发展,依赖于多民族文化传统的共同发展。单一的汉族文化或某个少数民族文化难以担当实现中国梦的艰巨使命,只有中华多民族文化共生发展、共同繁荣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因此,必须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在弘扬民族文化传统的过程中,积极发展优秀文化,改造与这个时代不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不断建构符合现代人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形态。传统文化只有通过改造才有出路,只有通过现代性的改革,才能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同时,全球化与地方性也能在传统文化的改造中找到一个链接的脉络,打开文化全球化和地方性知识发展的共生通道。

另一方面,在文化全球化视域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文化的全球化与地方性之争,其关键在于话语体系问题,核心在于话语权问题。文化强国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在文化全球化运作中,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掌握全球化文化变迁的话语权。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我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内容,也是在文化全球化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在。必须牢牢掌握中国文化发展的话语

权,在多元文化的交流中,不断培育中国文化的话语主导权,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基础。

仁富的《文化共生视域下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构研究》一书,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书稿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文化共生的理论,探索了在多元文化交流的环境中,如何实现多民族文化之间的共生发展、协调发展,尤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共生状况,揭示了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的规律,并提出了一些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模式,提出了和谐文化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的对策等,对推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具有参考价值。这项研究涉及复杂情况,目前成果难能可贵。不足之处亦在情理之中,正是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契机。希望不久看到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新成果,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地方性问题的系统研究中更上一层楼。

是为序。

前言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指出,“文化深深地改变人类的先天赋予”,它“在满足人类需要当中,创造了新的需要。这恐怕就是文化最大的创造力与人类进步的关键。”(马凌诺斯基, pp. 99—100)人创造文化,同样,文化也创造人。在一个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时代,推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必须要正视多元文化共生发展的实然。因而,本项目从文化共生的视域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文化共生与和谐文化的基本界定

我们认为,文化共生是指文化的多元化存在,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相互尊重、互补互惠、兼容并包、相互汲取与协同发展的过程和状态。一般而言,文化共生可分为多元文化的非良性共生和良性共生两种类型,不同的共生类型决定多元文化之间的发展状况和结果。就非良性共生而言,主要通过文化冲突、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改造和

文化同化等形式表现出来。其中,文化冲突是导致多元文化非良性共生的根本因素;多元文化良性共生,是指多元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兼容并包、互利互惠、协同发展。良性的文化共生主要通过多元文化的交流、互动、互补、合作等方式来实现。文化本质上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具有同其他文化系统进行交流,从中汲取有益因素。具有相互吸收、相互借鉴,促进合作的基本诉求。良性的文化共生为多元文化走向和谐奠定坚实的基础。良性的文化共生发展到一定时期就会促进文化和谐。文化和谐是以文化共生为基础,确切地说,是以良性的文化共生为基础。只有良性共生才能促进文化间的和谐,才能推动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与合作。

和谐文化是一种高级的文化形态,是文化和谐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和谐文化指称两个实体:一是和谐世界;二是和谐社会(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所谓广义上的和谐文化,是指人类最高级别的文化形态,是融合世界各种文明,世界各民族文化、各文化形态的精髓且具有一定高度的有机统一的文化共同体,属于和谐世界的范畴;所谓狭义上的和谐文化,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为了满足该国和谐社会建设之需要、体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本质特征的文化形态。在当代中国就指称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作为一种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先进文化,是其他文化发展的领路人,属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范畴。简言之,广义上的和谐文化为构建和谐世界服务,而狭义上的和谐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当然,它们之间并非完全隔开,而是紧密相连、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在厘清基本概念之后,对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提出进行了一系列的历史考察,试图在这个基础上得到经验与启示。

二、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提出的历史考察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主线,梳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西方古代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等,系统考察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提出经历了哪些过程。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包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及西方文化中的和谐思想等。这三个方

面的思想如同三根擎天大柱共同支撑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大厦。几千年的中华民族文化积淀了丰富的和谐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基石。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必须要充分汲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和谐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是指导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指针;西方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重要构成性资源和文化启迪。

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提出经历了长期曲折的探索历程。纵观我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迁的经络,大概经历了斗争文化、建设文化、改革文化、和谐文化等文化形态,每一个特殊的社会时期孕育着特殊的社会文化,昭示着文化的时代精神和人文特征。它们之间不是线性关系,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斗争文化与建设文化是交织发展的过程,改革文化与建设文化也是一个连续性的发展过程,和谐文化的发展与前面三种文化形态也有着一定的联结。只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发展形态的主次地位不同而已。从斗争文化到和谐文化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摸索过程,也反映出我们的党实事求是、求真务实、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品质。

文化变迁最终要落实到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层面上来,本书从核心价值观念冲突的两种基本形式(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出发,系统考察了新中国 60 多年来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变迁。指出不是每一个社会历史时期都能形成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但任何社会对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诉求却是永恒的。一定时期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并体现社会意识形态的精髓和本质。新中国 60 多年来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尽管都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往往充满迷雾,导致社会核心价值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涵、形态。

三、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现状审察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涉及语言文字共生、习俗共生、信仰状况、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共生等方面内容。

调查发现,语言文字共生主要包括少数民族语言之间的共生,少数民族语言与外来语言的共生以及少数民族文字与其他文字的共生;少数民族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习俗共生不仅仅局限于互相尊重彼此的习俗,共同发展,还表现在一些习俗是多民族共同认同的(如地方礼仪、民风、节日等),以及多种风俗的相互融合发展的现象。宗教信仰对少数民族群众具有独特的影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层的心理结构。一方面,少数民族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对许多自然现象感到困惑,宗教为其寻找解释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信仰宗教的传统,对一个民族、家族、村寨的心理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信仰共生包括原始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之间的共生。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共生状况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少数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与外来先进文化的耦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健康有益文化与外来健康有益文化的结合;少数民族传统落后文化与外来腐朽文化同流合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产业与现代文化产业的交融发展等。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取得可喜成果,但也存在一系列的瓶颈。近年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深入开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取得新成就,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不断培育广大人民群众的和谐理念、和谐精神,社会良好风尚进入新阶段。诚然,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基础设施总体而言还是比较滞后,还面临文化硬件与软件瓶颈、政策和机制瓶颈、两种不同核心价值观念的关系和话语瓶颈、文化环境与发展空间瓶颈等。

调查发现,少数民族地区多样性文化非和谐现象不容忽视。非和谐可分为以下三个层次:一是可调和的非和谐。这种非和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化解内部矛盾实现和谐,如城乡差距、观念差异、理念滞后、文化资源分配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等,这些都可以通过某些手段进行调节和化解,达到和谐状态;二是既可调而又无法彻底调和的非和谐。这个层次的非和谐主要涉及宗教、信仰、民族等。不同的宗教之间可以和睦共处,但也有宗教冲突,这就导致宗教可以调和但无法彻底调节。种族冲突是可以调和的,但要根除种族之间的冲突是很不可能的。因此,这种情况只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斗争中谋和谐;三是无法调和的矛盾。如分裂势力、恐怖主义、邪教侵袭等非和谐文化都是与和谐文化根本对立的,必须拿起斗争的武器,予以坚决反击、取缔和根除。

四、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共生与和谐 文化发展的机制、规律及模式

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机制主要包括理性选择机制、互利互补机制和竞生引领机制；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规律主要有：边际文化重叠规律、文化多元与政治一体的顺应调节律、文化自由选择与多元变迁有机结合律和少数民族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相互作用律等。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发展机制包括文化适应机制、文化变迁机制、文化认同机制等。文化适应机制是指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不断适应民族地区的地缘、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联系，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中最基本的机制；文化变迁机制是指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一定的自然、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不断发生改变的一种联系，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主要有主动变迁和被迫变迁两种类型；文化认同机制，即个体或群体在感情上、心理上对一定社会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文化观念、文化情感、文化心理等方面趋同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联系，以及各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

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发展包括传统模式和新型模式。传统模式又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的传统模式；二是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文化共生的传统模式。就前者而言，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发展的传统模式主要包括主——客模式、冲突——妥协模式、边际共生走向中心共生模式等；少数民族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共生发展的传统模式包括地缘共生模式、血缘共生模式、信仰共生模式等。针对这些传统共生模式，本书建构了两个层次的新型模式：即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新型模式，包括价值观念协调模式、多元信仰对话模式、多元文化平等共生模式；少数民族文化与周边国家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新型模式包括民间互动模式、民族文化产业带动模式、和平跨居文化模式等。

和谐文化具有两种存在机制：一种是内机制；一种是外机制。所谓内机制就是发展机制，外机制就是建设机制，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发展机制包括和谐文化的传承机制、和谐文化的创新机制、和谐文化

的规约机制等;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的建设机制主要包括自治区(省)、市、自治州、自治县、民族乡等一体化的网络建设机制,媒体宣传、学术研究、基地建设、各种活动等一体化的网络建设机制以及民众评价机制,等等。

少数民族地区和谐文化建设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主要包括:和谐文化与民族和谐相互促进律、和谐文化与少数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结合律、和谐文化与民族群众(认知、接受的)心理机制衔接律、和谐文化共建共享律等。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建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三个模式:政府主导模式、价值引领模式、和谐文化建设与遏制反文化相结合的模式。

五、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方略

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必须要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化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体制改革以及创新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文化共生和谐发展的路径。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根本。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最核心的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本书力图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和引领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四个方面进行研究。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而言,在内容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要讲究层次性、差异性;在形式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要注意不稳定性、突变性;在方式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要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实际利益相结合,避免空谈;在机制上,要建立政府主导、民众参与、社会监督、法律规范一体化机制,多管齐下;在环境上,优化认同环境,坚持一元引领多元,最大限度形成共识。

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具有两个基本层次:一是内容层次,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必须从抽象走向通俗化。内容的大众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众化的核心。内容的大众化关键在于话语体系的转换,即语言转向;二是实践主体层次,社会主义核心价